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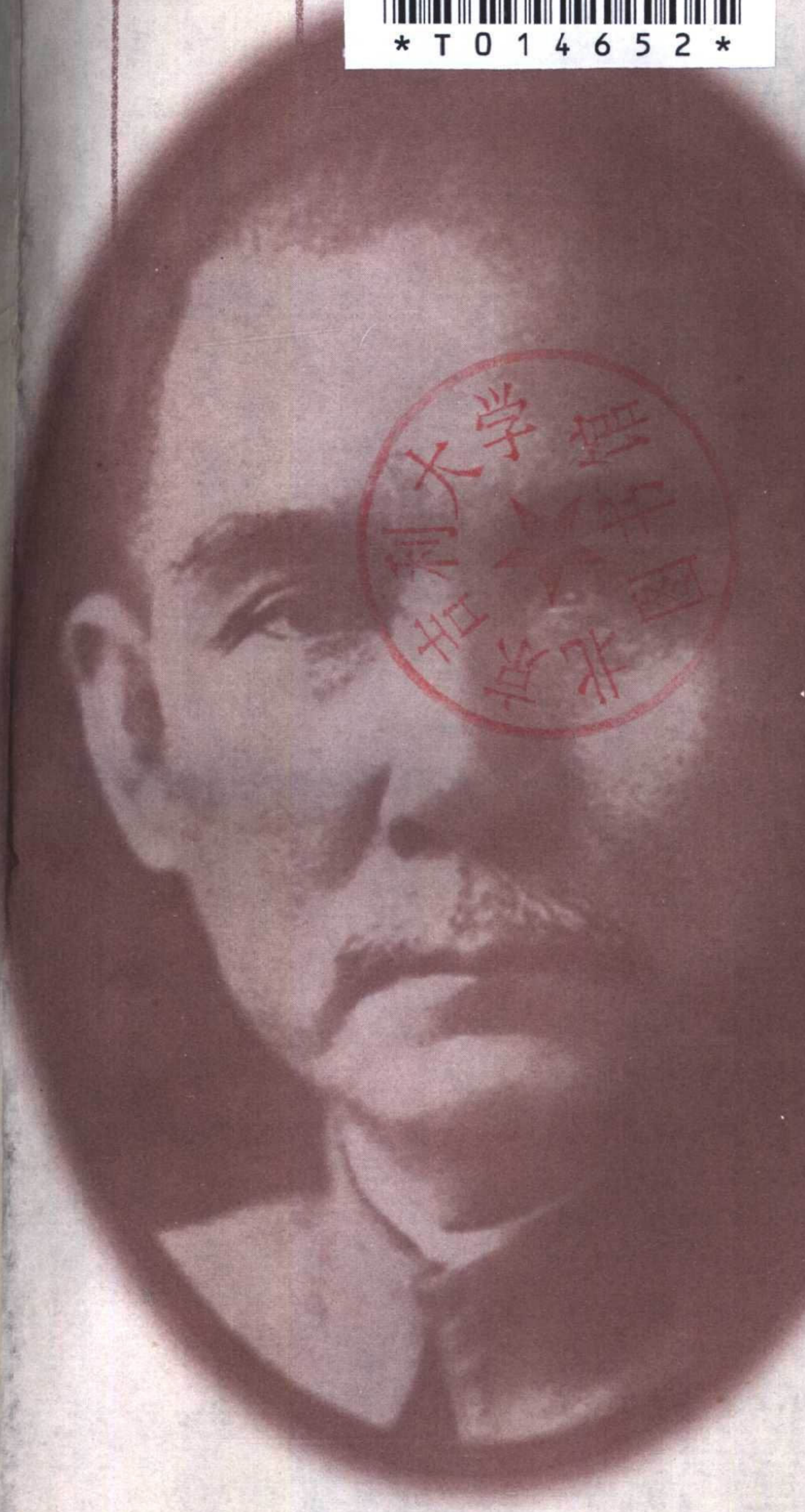
B25
4



* T 0 1 4 6 5 2 *

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

孙中山箴言录



“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

总序

尚 吟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群星煜熠的时代。

它少了先秦鸿蒙的元化和神锋，也不再具有汉唐气象的雄浑和矜贵；它无暇回味魏晋风度的虚灵和清逸，也绝然难以合着宋明道学的从容玄思，一任心神直赴天人之际。它只是带着无尽的屈辱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民族自我诘问，让一种悲郁的氛围死死攫住近代中国人的心灵。它打掉了一切矫情，俗常人们所必要的虚荣的润饰这时早已脱落得干干净净。民族在一度失了灵魂的重心后，或正把惶惑、怅恨、怨慕和微茫的期许寄托给了值得相托而存主自在的个我的灵魂。这是一个没有“箴言”灵感的时代，但几乎每个以生命进入问题而又以亲切的答问涵养了自己生命的人，都用自己全幅人生把一份箴谏留给了历史。

这个时代的全部情采都可以赅入“五四”主流知识分子援自尼采的一个命题：“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重估”意味

着由道揆而法守、由意义而秩序的民族文化的整全自觉，自觉的契机则在于被一代儒学大师熊十力断言为“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的“中西之辨”。

中国的近代是从对西方的重新发现开始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最初以极不文明的方式启示给东方的则是所谓“富”和“强”的价值。由东西校雠而突显的“富”、“强”的魅力，使一向以“天朝”自视的中国感到技艺上的自愧不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想固然多有“制夷”的权度，却也标志着中国文化在技艺层次的一种自觉。“洋务”的勃兴是魏源的主张的富于喜剧意味的实现，但“技”在纯粹技艺领域的未可指望，使一批敏锐的中国人把对“技”的倚重引向对“政”的反省。对孔子的微言大义的衍发，作了戊戌变法的前导，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改良政制的纲领并不曾含有多少血和火的消息。无论如何，“戊戌”时期最深邃的思想家严复，即使在温和的变法被扼之以刀剑之后，也还是更看重“开民智”、“新民德”的精神教化作用，但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孙中山就已经由对政治改良的不无期望转而主张激切的、毫不妥协的革命。“辛亥”革命终于使中国有了“民国”和“共和”的名分，但一个几乎无须争辩的事实是，“驱除鞑虏”的民族意识对于革命的刺激显然更大些。与“辛亥”的内在的民族主义性质相谐相盈的莫过于章太炎的“以国粹激励种性”的观念，而章氏晚年倡导尊孔读经也许才真正以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触到了关联着民族精神的“教化”。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继“技”的自觉、“政”的反省后的“教”（教化、价值祈向）的重新认取，陈独秀断言

这文化上的深层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五四”所启示的人生价值主要在于身心的“幸福”，但它对“自由”、“个性”、“主观之内面精神”的提撕，却对于德行“高尚”——人生又一个向度上的恒常价值——所当涵有的“自律”原则的再确立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鲁迅所谓“掙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李大钊所谓“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胡适所谓“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这些“摩罗”们的呐喊和剖白，似都可以涵摄于“新青年”主将陈独秀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的意趣非凡的诠释，他说：“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一个造成整个民族心灵动荡的文化思潮不可能无所偏至，“五四”对传统批判的某种偏至引出的是旨在矫治这一偏至的另一种风致的文化思潮。这即是所谓“当代新儒学”。新儒学胎动于20年代初梁漱溟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辨说，但这位“生命化了孔子”的人物毕竟在“并不以人类文化有什么价值”的佛格中。与佛光烛照下“做孔家生活”的梁漱溟构成一种照应，以“亦佛亦儒”的措辞表达所谓“新唯识论”的熊十力为寂寞中复兴的儒学做了“奠其基，造其模”的工作。在“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和当代新儒家的满腹狐疑的对视中，一种必要的张力把关联着民族的时代教化——人生的现实而终极的眷注——的思考引向深入。

循着“技”的自觉、“政”的反省和“教”的重新认取

的线索，“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丛书从1840年后的一个世纪的历史中选取了十五位有代表性的思想（或兼政治）人物，分集辑录他们千秋各别的一家之言。他们是：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严复（1853—1921）、孙中山（1866—1925）、章炳麟（1869—1936）、蔡元培（1868—1940）、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1880—1942）、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4—1968）。所辑句段虽强名之以“箴言”，却并不限于道德训诫或行为劝勉上的格言、警句；那些为编辑对象的生命气象所笼罩的有关宇宙、人生、文化、志业、议政、论学、趣真、审美、情谊、信仰等方面的论断，皆在编录之列。“箴言录”以编辑对象为本位，力求以不失内在逻辑的分类编次使被辑选的言荃得以隐约勾勒出对象的某种生命格局。倘落于言荃，“箴言录”中的箴言或并不能如所期待的那样找出很多；倘不落言荃而直趣心源，每个编辑对象的独异的心灵之光照在哪里，那里的文字便有可能被点化为堪称箴言的箴言。

就编者的水准看，“箴言录”中的错讹疏漏是可以想见的，但这里诚恳希冀于人们的，除开理所当然的匡正和批评外，也有对这套丛书的宗趣的如是理解：宣示前贤精神中某些具有弥久启示意味的东西，生命化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时代，以规勉、警策那些背负民族希望继续寻路而进的新一代人。

孙中山简介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一号中山。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

早年从医，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主张，遭拒绝后赴檀香山发起组织兴中会而把希望诉诸革命。1905年，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二年被迫辞职。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当选为理事长。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次年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孙氏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24年1月在广州主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11月，应邀北上讨论国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氏以“太极”称述世界的物质本原，以“生元”称述细胞为生命之原，认为宇宙经历了物质、物种、人类三个进化时期：

由太极到地球，由生元到生命，由生物到人类。他倡言“知难行易”学说，把知行进化过程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时期，并据此将人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强调了“先知先觉者”的历史作用。“三民主义”是他的革命纲领，行政、立法、司法、考选、纠察等“五权分立”则是他理想中的民主共和政体。

孙中山的主要著作有：《救国全书》、《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中山革命全史》等。

目 录

一	宇宙·人道·知行.....	(1)
	1. 太极·生元·心.....	(2)
	2. 气力·神权、君权·民权.....	(4)
	3. 行易知难.....	(8)
	4.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	(14)
二	文化抉择与民族前途.....	(16)
	1. 东西文化：“王道”与“霸道”.....	(17)
	2. 西方的启示——“富”、“强”的价值.....	(21)
	3.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	(28)
	4. “改造中国之第一步”.....	(33)
	5. 驳“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	(43)
	6. 中国问题的世界意义.....	(49)
	7. “立国之本”——三民主义.....	(53)
三	民族主义.....	(59)

1 . “ 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 ”	(60)
2 . “ 要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	(62)
3 . “ 恢复民族主义 ”	(64)
4 . 从 “ 民族主义 ” 到 “ 世界主义 ”	(71)
四 民权主义	(76)
1 . “ 民权 ” —— “ 人类进化之极则 ”	(77)
2 . “ 民权 ” 与 “ 天赋人权 ”	(82)
3 . “ 政权 ” 与 “ 治权 ”	(92)
4 . 五权宪法	(99)
五 民生主义	(103)
1 . “ 民生 ” 与 “ 大同 ”	(104)
2 . 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	(107)
3 . 民生需要与民生政策	(113)
六 人文杂论	(115)
1 . 政治 · 政党	(116)
2 . 国家 · 法律	(123)
3 . 科学 · 宗教	(130)
4 . 修养 · 学术	(132)
5 . 其它	(137)

一、宇宙 · 人道 · 知行

1. 太极·生元·心

旷观六合之内，一切现象，罄然毕陈，种类至为繁夥。今先就其近者小者言之，一室之内，一案之上，茶杯也、木头也、手表也，奔赴吾之眼中者，吾皆能缕指其名，以其有质象可求也。再由一室一案推而至于桂林一省，地大物博，种类更多，或有为吾所不能知，所不能名者。再由桂林推而至于各省，或全国，或世界，则形形色色，虽集多数博物家，不能考求其万一。物类之繁，概可知已。然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之精神为之。二者相辅，不可分离，若猝然丧失精神，官骸虽具，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失，而体亦即成为死物矣。由是观之，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人类而失精神，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虽现今科学进步，机器发明，或亦有制造之人，比生成之人，毫发无异者，然人之精神不能创造，终不得直谓之为入。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我既为人，则当发扬我之精神，亦即所以发扬为

人之精神。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

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伊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

推到地球没有结成石头之先……普通都说……是一种流质；更在流质之先，是一种气体。所以照进化哲学的道理讲，地球本来是气体……日久凝结成液体，再由液体固结成石头……。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类的来源。地质学家考究得人类初生在二百万年以内，人类初生以后到距今二十万年，才生文化。二十万年以前，人和禽兽没有什么大分别，所以哲学家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渐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

古人有言，“人为一小天地”，良有以也。然而以之为一小天地，无宁谓之为一小国家也。盖体内各脏腑分司全体之功用，无异于国家各职司分理全国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机关，其

组织之完备，运用之灵巧，迥非今世国家之组织所能及。而人身之奥妙，尚非人类今日知识所能穷也。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生元之构造人类及万物也，亦犹乎人类之构造屋宇、舟车、城市、桥梁等物也；空中之飞鸟，即生元所造之飞行机也；水中之鳞介，即生元所造之潜航艇也。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里氏发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则前时之哲学家所不能明者，科学家所不能解者，进化论所不能通者，心理学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贯通，另辟一新天地为学问之试验场矣。人身既为生元所构造之国家，则身内之饮食机关，直为生元之粮食制造厂耳；人所饮食之物品，即生元之供养料及需用料也。生元之依人身为生活，犹人类之依地球为生活，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犹人之居住于各城市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

2. 气力·神权·君权·民权

进化论乃十九世纪后半期，达文氏之《物种来由》出现而

后始大发明者也，由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然而古今聪明睿知之士，欲穷天地万物何由而成者众矣，而卒莫能知其道也……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也……夫进化者，时间之作用也，故自达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理，而学者多称之为时间之大发明，与奈端氏之摄力为空间之大发明相媲美。而作者则以为进化之时期有三：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伊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今太空诸天体多尚在此期进化之中。而物质之进化，以成地球为目的。吾人之地球，其进化几何年代而始成，不可得而知也。地球成后以至于今，按科学家据地层之变动而推算，已有二千万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类自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尚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

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

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

达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

从前学说，准物质进化之原则，阐发物竞生存之学理。野蛮时代，野兽与人类相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弱者劣者，自然归于天演淘汰之例。故古来学说，只求一人之利益，不顾大家之利益。今世界日进文明，此种学理，都成野蛮时代之陈谈，不能适用于今日。今日进于社会主义，注重人道，故不重相争，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3日）

世界进化，当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所用的是气力，大家同心协力杀完毒蛇猛兽；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人同

兽争以后，便有天灾，要和天争，便发生神权。

由有历史到现在，经过神权之后，便发生君权。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权力夺了，或者自立为教主，或者自称为皇帝。于是由人同天争的时代，变成人同人争。到了人同人相争，便觉得单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维持人类社会，不能够和人竞争，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强盛才可以和别人竞争。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从前人同人争，一半是用神权，一半是用君权。后来神权渐少，罗马分裂之后，神权渐衰，君权渐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为极盛的时代。他说：“皇帝和国家没有分别，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国家。”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极点，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睬。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

抗就是革命。所以百余年来，革命的思潮便非常发达，便发生民权的革命。民权革命是谁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

再概括的说一说：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

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

盖人类生存，固以食为第一之需要，不得食则死亡随之，此自一定之理。然人类之欲望，断不仅限于食之一途，而维持人类之生存，食之外又必有赖于其他之种种。故人类欲维持其生存而满足其欲望，于是有种种事业之发展进步也，而人类遂日趋于进化。故于食以外，必有种种文明事业随之而渐〔逐〕逐〔渐〕发达，因之社会日趋文明，人类日就进步。盖食为人类有限之需要，既饱之后，则不欲多求。而食外之种种需要，其欲望乃为无限。盖愈有则愈求，愈得则愈欲，所谓得步进步，精益求精。欲望既日求扩充，文明斯日趋进步。故进化程序，既由农业时代进而为工业时代，步步前进，永不后退。虽农业之发达可以有限，而工业之发达实乃无穷。此后世界只有日趋向前，断不能废除现世之文明进步，而复返于原始状态也。

《复林修梅函》（1919年8月17日）

3．行易知难

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